

中国共产党“干部”概念的多重内涵*

熊成帅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9)

[摘要] “干部”是党史党建领域的重要概念,具有多重内涵。常见的“干部”概念主要是指机构的管理者,实质上是一个职务概念。同时,“干部”概念还表示一种政治身份。职务意义上的“干部”,是完成革命任务或治理任务的办事员,是身处科层制组织中的行政官员。政治身份意义上的“干部”概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运动和国家治理的实践主体,是身处政治组织中的革命者或政治家的自我指称。政治身份意义上的“干部”,除了承担事务性工作以外,还具有服从政党要求、推动实现政党政治目标、做出政治决断的责任与使命。因此,“干部”既是管理者、公务员,又是革命者、政治家。通过将“干部”概念与“群众”“职业革命家”“韦伯式官僚”等概念加以比较,考察不同概念的相互关系,可以揭示“干部”概念中身份内涵的丰富内容。干部与群众之间,并非是主导者与被主导者的关系,而是处在相互建构的动态过程之中。通过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干部得以获得和维持自身的身份认同。政治身份意义上的“干部”概念与列宁主义的“职业革命家”概念有相似之处,但“干部”概念还具有内在的人格属性和价值内涵。列宁主义的“职业革命家”概念强调的是“以革命为职业”这样一种外在的政治身份规范,“干部”概念包含的“革命者人格”则强调干部内在的自我规范,这种规范涉及干部内心深处的价值追求,外显为干部群体兼具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独特人格。对“干部”概念的考察与界定,是开展相关研究的基础。

[关键词] “干部”概念 政治身份 革命者人格 职业革命家

[中图分类号] D03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83X(2023)04-0005-10

“干部”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重要概念。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正式文件和党内政治生活中,频繁使用“干部”一词,并以其为基础发展出“干部政策”“干部路线”等政治术语。然而,“干部”概念并非不言自明,历经一百年的演进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概念具有了高度复杂性。既有对“干部”概念的研究,或是从静态的语义分析角度分解“干部”概念,将“干

部”与领导者、公职人员等概念等同以强调“干部”概念的行政职务含义^[1];或是基于历史文献爬梳中国共产党对“干部”的多项要求,凸显在政治身份意义上中共干部的整体形象。^[2-3]这些研究关注到“干部”概念的某个方面,但尚未对“干部”概念的内涵进行整体性的把握与阐释。诞生并流行于民主革命时期的“干部”概念,既是一个职务概念,又表示一种政治身份,还具

收稿日期:2022-07-27;修回日期:2023-05-15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项目“全面抗战时期川渝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干部培养工作研究”(XNZZSH2120)

作者简介:熊成帅,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共干部教育史研究。

有“革命者人格”的特殊含义,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塑造新人的政治理想。中国共产党“干部”概念中“革命者人格”的内涵,尚未得到充分阐释。基于此,本文在比较“干部”概念与“公务员”“官僚”“革命者”等概念的基础上,对“干部”概念的多重内涵进行讨论。厘清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中“干部”概念的内涵,是打开中国共产党独特政治文化的一把钥匙,也是开展干部工作的理论基础。

一、“干部”概念的历史源流与职务内涵

(一) 围绕“干部”概念的争论

干部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国与治国理政的重要推动力量。在近现代革命历史中形成的“干部”概念,对于政治实践与理论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在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提出“干部”概念已经成为一个大一统的概念,包罗万象,应该使用类似于“公务员”“企业管理人员”这样具体的概念将其分解,干部体制应该进行改革以便于建立公务员制度。^[4-5]批评者认为,“干部”作为一种政治身份,不像职务一样可以退休或退出,在客观上具有终身性,因而应该使用“公务员”这样的职务概念来代替这一身份概念。从逻辑来讲,政治身份的终身性当然不等同于政治职务的终身性,上述批评似乎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在政治实践过程中,由于干部退休制度长期未能建立,干部政治身份的终身性客观上成为了政治职务终身制的思想基础。同时,“干部”概念指涉的范围不断扩大,因而被称为“干部”的人数大量增加,又围绕干部群体建立了生活福利和医疗保障体系。到20世纪80年代时,干部职务终身制逐渐成为一个实际问题,进而影响到学术界对“干部”概念的认识。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指出在干部制度中存在职务终身制问题,要求加快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职务的任期,以

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6](P149)}在此背景下,有学者提出“干部”概念已经过时,主张“大一统的干部概念需要合理分解”。^[5]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干部”概念在政治实践中始终保持着旺盛活力,相关讨论在没有得到有效回应的情况下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上述对“干部”概念的质疑,基于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政治背景而提出,并非没有现实基础。“干部”概念兼具身份属性和职务属性,二者的界限的确容易混淆并带来系列问题。

然而,相关讨论由于缺乏对“干部”概念内涵的系统把握,忽视了“干部”概念的内在活力,进而对干部体制所具有的政治动能理解不足。“干部”概念具有的多重内涵,是中共干部体制发展出自身的独特优势的基础。其一,“干部”概念有效整合了各类别的公务人员,确保各类别的公务人员都在党组织的领导之下;其二,中国共产党在赋予公务人员以“干部”身份的同时,对公务人员提出了除了完成日常工作之外的更为严格的政治要求,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公务人员的政治动能。这两个优势都有利于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之所以具有这两个优势,恰恰在于“干部”概念不仅仅是一个职务概念,同时还具有身份属性。此外,借用“公务员”概念对“干部”概念提出批评的学者没有意识到的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语境中,“干部”概念同时还包含着“革命者人格”的含义,而这是“公务员”概念与韦伯式“官僚”概念所不能涵盖的。要回应对“干部”概念的质疑,有必要梳理“干部”概念的历史源流,厘清“干部”概念所具有的职务、身份、人格三重内涵。

1986年,中共中央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条例》改名为《国家公务员条例》,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曾经属于“干部”群体中的部分人员此后将以单纯的“公务员”的身份出现。^[7]2006年,《公务员法》正式实施,为干部职务任期制构建起制度保障

体系的同时,也使得“公务员”概念正式从“干部”概念中分解而出。^①与“干部”概念相比,“公务员”概念的职务属性得到强化,而政治身份的属性大大减弱。1982年中共十二大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8](P30)}随着人事制度改革的推进,中国共产党在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同时,保留并凸显了干部概念的身份属性,从而在政治实践层面有效解决了八十年代的争论,同时激活了“干部”概念的有效性。

(二)“干部”概念的历史源流

经过长期演进后,“干部”概念具有了机构的管理者、组织中的骨干、革命者等多重含义。中文中的“干部”由日语“幹部”(かんぶ)直译而来。日语中的“幹部”源于法语中的“Cadre”,基本含义为“框、框架、车架、骨架、骨干等”。^[1]在日语中,“幹部”有三层含义:树干;团体、公司的首脑;部队中对将校、下级士官的称谓。^{[9](P427)}进入中文后,“干部”保留了后两层含义,主要作为政治概念加以使用。据考证,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最早在中文中使用了“干部”一词。日本留学生使用“干部”概念翻译《明治政党小史》一文中的“幹部”。1901年,这篇文章刊发在梁启超于横滨主编的《清议报》第100期,其中提及明治时期的政党,“其干部之组织,则设总理及副总理各一名,党议员若干名,干事五名,俱属党员公选”^{[10](P7-9)}。此时,“干部”的含义便是指政党中的核心骨干。^[2]到现在为止,中文中的“干部”概念几乎总是与政治团体或政治活动相关联。在近代中国的政治组织中,国民党较早且较为频繁地使用“干部”概念,用以表示党内的核心骨干,地方军阀阎锡山也常用“干部”一词指称其政治团体中的骨干成员。

“干部”概念在中文中的多重内涵,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创造出来的。在中

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中共使用“干部”来指称党内的骨干成员。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第二章第四条有如下论述:

“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每一个机关或两个机关联合有二组织以上,即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指定若干人为该机关各组之干部。”^{[11](P94)}第二章第八条有如下论述:“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任期均半年,组长任期不定,但均得连选连任;干部人员由地方执行委员会随时任免之。”^{[11](P95)}此时中共语境中的“干部”概念指的是党组织中起核心作用的党员。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主要是指承担着动员领导群众、开展革命运动等政治任务的职业革命家。随着苏维埃根据地的成立,中共党组织内的革命者同时成为根据地政权的领导者,“干部”概念逐渐具有了革命者与治理者的双重含义。

新中国成立后,干部在指称特定政治身份的同时,也指称身处各类组织中处于领导岗位的人。因此,“干部”概念所指称的人员在类别上和数量上快速扩大。这一时期,中共的“干部”概念深受前苏联影响。《苏联大百科全书》对“干部”概念的解释是:“干部是党组织、苏维埃组织、经济组织、职工会组织、共青团组织和其他组织的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中,以及科学和文化工作者,陆军和海军军人,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种专业工作人员中的基本常备人员。”^{[12](P1)}新中国成立后的“干部”概念与此类似,同样包括了党组织、政权机关、群团组织、军队、学校等各类机构中的工作人员。这样,“干部”概念所指称的对象就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干部群体内部具有较强的差异性。在工厂中,“干部”与“工人”成为划分工作人员的两类基本身份,“干部”成为与“工人”相并列的概念。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随着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公

^①2002年,中共中央修改并颁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可见“干部”概念与“公务员”概念在新时期的政治生活中同时得到使用,但在公务员概念产生后,“干部”概念集中于党政系统使用。

务员”有时甚至取代了“干部”，成为人们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指称。当然，两个概念的内涵实质上存在较大差异。

（三）“干部”概念的职务内涵

在“干部”所包含多重含义中，最为常见的“干部”概念主要是指机构的管理者（特别是政治组织与政权机构的管理者），实质上是将其视为一个职务概念。在《中国共产党建设大辞典》中，对“干部”词条的解释如下：“我国的干部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情况：一是与群众相区别，指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人员，如‘乡干部’‘街道干部’。二是泛指党和国家机关、群众团体中担任一定职务的工作人员，如党委书记、处长、科长、科员等。三是指党和国家机关、群众团体中的工作人员（勤杂人员除外），文教、卫生、体育、科技等各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企业、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等。四是我国历年干部统计的范围和对象是：农村乡、镇和城市街道以上各级党委、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政协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办事机构、全民所有制企业、企业单位和国家派到集体所有制事业、企业单位中相当于办事员以上的并保留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行政管理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以及上述范围的离休、退休人员。”^{[13](P498)}这里对“干部”概念的定义，突出强调了干部担任“领导职务”或“一定职务”的特点。从“职务”角度对干部进行的定义，主要目的在于方便对干部进行统计学意义上的归类。

干部除了职务身份外，还具有政治身份等其他内涵，因此仅仅通过职务对干部进行定义是不合理的。在上述辞典的定义中，“干部”应该担任“一定职务”，但“职务”究竟包含哪些，实际上是模糊不清的。例如，“村干部”与“国家干部”都被称为“干部”，但其所担任的职务却有着很大差别。究其原因，就在于“村干部”所指代的“干部”仅仅是一种政治身份，表明拥有这个政治身份的人在特定村庄中是核心骨干，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领导干部。在现实生活中，“干部”概念常常被泛化使用，以用于描述

某一团体中的骨干成员，而不一定是担任“领导职务”。例如，“学生干部”所指的学生，很难说担任了领导职务，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管理人员”，而仅仅表示学生中的骨干成员。

二、“干部”概念的身份内涵

（一）身份内涵与政治认同

除了表示职务身份外，“干部”概念的另一重含义就是具有特定政治身份的人。中共语境中的“干部”概念之所以复杂，就在于“干部”概念内涵中的政治身份和政治职务常常混杂在一起。政治身份意义上的“干部”，是中国共产党追求共产主义、领导革命运动的实践主体，是身处政治组织之中的革命者或政治家的自我指称。由于具有政治身份，作为“干部”的个人除了承担事务性工作以外，还兼有服从政党要求，推动实现政党政治目标的责任。职务属性意义上的“干部”，是完成革命任务或治理任务的办事员，是身处科层制组织中的行政官员。在党组织内，“干部”概念对应着政治身份属性，而在具体的业务机构之中，例如政权机构、军事组织、群团组织等机构内开展具体工作时，“干部”概念则对应着职务身份。可以说，共产党的“干部”既是革命者、政治家，又是管理者、公务员。

《中国共产党建设大辞典》对“党的干部”这一概念的解释，便是依照“干部”概念的政治身份内涵给出的：“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党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并且要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党的干部必须接受党的培养，接受党的考察和考核。党员干部要善于同非党干部合作共事，尊重他们，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13](P499)}中共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也强调：“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要做到忠诚干净担当。”^{[14](P94)}可以看到，“党的干部”概念不再是从统计学角度给出的具体

标准,而是从身份角度对“干部”进行的系列规范。当然,这里给出的身份概念仅仅从党的角度强调了干部具有“骨干”和“公仆”两重身份,而“骨干”与“公仆”的含义依旧颇为模糊,“干部”概念所代表的政治身份还需要进一步厘清。

政治身份包含“政治认同”(political identity)与“政治地位”(political status)两层含义,以政治认同为核心。日常生活中,“身份”一词同样也包含“地位”和“认同”两层含义。就政治身份而言,干部的政治身份源于党组织与干部、群众与干部之间的相互认同:一方面是党组织对干部的认同使得干部具有了干部身份,群众对干部的认同使得干部身份得以落实和维持;另一方面是干部对党组织的认同与对群众的认同,构成了干部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基础,同时使得干部身份得到强化。因此,中国共产党给干部进行的教育培训中,部分教育内容的目的就在于强化干部的身份认同,继而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政治话语和方针政策。通过分析“干部”概念与“群众”“韦伯式官僚”“职业革命家”等概念的相互关系,可以更为清晰地呈现“干部”概念所具有的职务与身份内涵。

(二)“干部”与“群众”概念

从“干部-群众”的相互关系中,可以深入理解“干部”概念身份内涵的丰富性。在一些学者看来,“干部”与“群众”是主导者与被主导者的关系。丛日云认为,近现代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引入了民主理论对传统“民”的概念进行改造,从而重新塑造了“人民”概念,并将“人民”提升为国家的本体与国家的主人。^[15]由此,“人民”作为一个抽象整体被赋予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人民”概念过于抽象,从而往往需要被具体化为“群众”的概念。群众虽然不享有“人民”概念的神圣性,不能视为国家权力的主体,但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人民”概念的具体化的形式之一。^[15]由于“群众”是“人民”的具体化,仅仅模糊地分享了“人民”所具有的神圣性质和权力属性,因此“群

众”成为了一个较为弱势的概念。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虽然并非封建政治中的“统治-被统治”的关系,但却是“主导者-追随者”的关系。在这对关系中,一方面,群众与干部之间相互依托、相互构成,二者具有身份的一体性,利益的一致性和目的的共同性;但另一方面,二者之间包含着特定的上下关系,二者利益的一致性需要干部到群众中加以识别和概括才能发现,二者目的的共同性需要干部对群众进行教育引导才能得到群众的认同。因此,群众的政治地位要低于人民,群众需要干部的引导和教育。李里峰则认为“群众”实际上是“人民”概念的同义词,可以合并为“人民群众”概念加以使用,二者在权力归属和道德评判上都具有至高无上性。^[16-17]不过,即使“群众”与“人民”是同义词,在“干部-群众”的关系中,干部依旧占据主导地位,与群众之间依旧有“主导者-追随者”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工厂中通常将所有的人分为“干部”与“工人”两种身份。

“干部-工人”的身份关系与“干部-群众”的身份关系类似,干部作为管理者承担工厂管理任务的同时,也是党组织委派或信任的工厂骨干,具有在政治上发挥主导作用的身份合法性。

然而,上述理解忽视了概念产生的历史语境,未能完全揭示“干部”概念的政治身份内涵。在上述概念系统中,“干部”实际上成为了完全意义上的“领导者”,干群关系被理解为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样一种将干部与群众置于对立关系加以理解的方式,为了追求逻辑上的完整性,反而遮蔽了“干部”与“群众”两个概念生成的历史语境,也遮蔽了“干部”概念所蕴含的政治动能。事实上,“干部”与“群众”概念均产生于中国近代的革命历程之中,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获得自身确切内涵的。只有在近代革命的语境中,只有在充分考虑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目标、中国共产党所遭遇的多重困难与现实处境的情况下,“干部”概念的确切含义才能得到准确理解。

在近代中国革命的语境中,“干部”与“群

众”并非简单的“主导者-追随者”关系，而是处于相互创造、互为参照的关系中，相互建构并共同组成了革命事业、建设事业与改革事业的政治主体。正如汪仕凯与陈沿潮所指出，政治意义上的“群众”的产生是一个动态过程，中国共产党首先将阶级联盟的成员转化为群众，再将群众凝聚为人民。在漫长的革命历史中，中国共产党通过与群众结合，塑造了作为政治实体的“人民”，从而以“人民”为政治基础构筑起了统一的现代国家。人民永远处在不断形成的状态，党与群众永远需要不断结合、相互塑造，从而持续不断地塑造人民。^[18]汪世凯等学者所未能注意到的是，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干部”实现对“群众”的动员与组织，“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整合、相互创生的。在近代革命历程与现实政治生活中，干部并不是天然的“主导者”。曾经身处于形形色色的封建性的社会关系中的“臣民”或“百姓”，能够从一盘散沙的状态聚合成为新的政治主体“群众”，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不断动员、不断组织、不断建构新的意识形态体系的结果。^①而干部自身，也正是通过组织群众与服务人民获得了自己的政治身份。新中国成立后，在建设事业与改革事业之中，“群众”依旧处在动态生成的过程之中，而“干部”也需要通过组织群众与服务群众来维持和再生产自身的政治身份。这就是“公仆”一词所代表的身份内涵。

（三）“干部”概念与“官僚”概念

如果将“干部”概念与韦伯式的“官僚”概念加以对比，可以更为清晰地展现中国共产党“干部”概念的身份内涵。“官僚”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在传统官僚制与现代官僚制（科层制）中，“官僚”的概念几乎完全不同。马克斯·韦伯对现代官僚制中的“官僚”概念做了经典定义，揭示了现代官僚的核心特点：第一，现代官僚具有特定的管辖权限、进行受约束的持续的公务

行为；第二，官僚体系遵循等级制原则，故而也可称之为科层制体系；第三，官僚需要提前进行长期的技术训练，遵循固定的选拔流程；第四，官僚不能长期占据特定职位，在行政过程中，官僚自身的个人特点被压制，而只体现出职位特点；第五，官员与生产资料或行政手段的所有权彻底分离；第六，现代官僚的专业化程度高，围绕现代官僚建立的官僚制具有高度的精准性、稳定性、可靠性、可计算性和严格的纪律性，可以高效率、大范围运作，形式上能适用于任何一种行政任务。^[19]马克斯·韦伯所定义的现代官僚，仅仅是作为适应“现代化生产的技术复杂性”而形成的行政管理工具。^{[20](P74)}依托高度专业性的现代官僚建立的科层制，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得以高效运转和不断再生产的基础结构。现代官僚的个人身份被压制，仅仅以职务身份出现，人变成了从事管理的高效工具。

与之类似，作为一个现代政党，中国共产党语境中的“干部”同样具有韦伯式官僚的专业性、去个人化、等级化等特征。然而，韦伯式官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其仅仅具有职务属性，而尽可能地压抑自身的身份属性。中国共产党语境中的“干部”，却在具备职务属性的同时，依旧保持着自身的政治身份。理论意义上的韦伯式官僚，不应该也不可能在日常政治中做出价值判断，特别是不需要做出政治决断，而只需要服从于科层制的运转命令。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却恰好相反，干部不仅具有高度的政治意识，而且需要在日常工作中做出自己的价值选择与政治决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干部”概念在早期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是一个与“职业革命家”相近的概念，如今又具有了与“政治家”相近的内涵。党的干部，是开展革命活动和领导国家建设的骨干与先锋。

（四）“干部”概念与“职业革命家”概念

“职业革命家”是列宁主义的词语创造，

^①相较于普通党员，党组织对干部的政治认同更高，干部对党组织的认同也要更高，由此增加了干部身份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但党员身份依旧是干部最重要的政治身份。陈云在谈到党员教育与干部教育的区别时也曾说过：“党员与干部应该标准差不多，但要求干部必须严格。”陈云. 陈云文集（第1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352.

是一个典型的身份概念。所谓职业革命家，就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21](P118)}职业革命家不仅以革命为其职业，而且以革命家为其身份。也就是说，职业革命家无论其从事何种具体工作，都不以具体的工作职务为自身的第一身份。职业革命家和职业革命家组织是列宁主义政党强大力量的来源。列宁曾明确提出：“革命家的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既然这种组织的成员都有这种共同的特征，那么，工人同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更不用说他们各种不同的职业之间的区别了。”^{[21](P107)}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区别是基于职务属性建立的彼此身份的区别，而这种身份被消除之后，留下的就是革命家的统一的政治身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一度要求所有的党员都成为职业革命家，都依靠党组织生活。随着党组织的扩大，中国共产党日益成为一个“群众党”。此时，未必所有的党员都还视自身为职业革命者，但所有干部的基本政治身份依旧还是革命者。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依旧强调：“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①

当然，干部承袭了职业革命家政治身份的同时，也增加了职业革命家所不具有的职务内涵。与职业革命家相比，干部除了从事革命运动以外，还承担着社会治理或机构领导的职能。职业革命家概念没有职务属性，个体所从事的职务工作往往只是其从事革命工作的伪装，但干部却有职务属性。在中共政治文化中一般有“高级干部”（高干）、中层干部、基层干部的区别。这里的高级、中层、基层之分，主要依据不同层级的行政机构和干部的行政级别进行划分。职业革命家则很难进行“高级革命家”、“中级革命家”与“基层革命家”这样的分类。

三、“干部”概念的人格内涵

在职务与身份两重内涵之外，本文尝试提出，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干部”概念还具有第三种内涵：“革命者人格”。相比较于列宁主义的“职业革命家”概念，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概念还隐含着道德层面的规范。当然，这里的道德是在革命历史中形成的“革命道德”。如刘少奇所说：“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同时具有严格而清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和阶级性）。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不是建筑在退化的、保护个人及少数剥削者的利益之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无阶级与最后解放全人类，解放世界出于水火，建设幸福美丽的共产主义世界之利益的前进的基础上。”^{[22](P88-89)}刘少奇所论述的主体虽是全体共产党员，但这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经典文献却主要是中共干部的学习教材，其立说的对象主要还是中共干部。如果说列宁主义的“职业革命家”概念强调的是“以革命为职业”这样一种外在的政治身份规范，那么“革命者人格”强调的则是干部自身内在的自我规范，这种规范涉及到干部内心深处隐秘的价值坚守，塑造了干部群体特殊的人格品质。

在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干部人格中，自我牺牲性和组织性是中共干部两个鲜明的特征。中共干部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将个体生命置于民族解放与人类解放的世界历史之中加以理解，将个人从事的具体工作与宏大的历史发展进程密切关联起来，从而使中共干部个体性的生命历程构成了整体性的社会历史进步的组成部分。此种颇具理想主义气质的人生观与历史观，为中共干部构筑了一种追求自我牺牲的

^① 习近平总书记曾两次在重要场合讲话时强调：“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向周恩来同志学习，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要忘记我们是革命者，任何时候都不要丧失理想信念。”参见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 人民日报，2018-01-06(1)；习近平. 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8-03-02(2).

精神气质和人格特质。自我牺牲并不是一种道德说教,而是基于系统的世界观、历史观与人生观形成的生命追求。中共干部的基本身份是革命者,是职业革命家,是献身革命的人。曾长期主持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陈云指出,共产党的干部“要确定自己应该是创造共产主义新时代的一个牺牲者”。^{[23](P78-79)}一方面,“共产主义事业还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现——自己看不到”;另一方面,“这个事业要遭遇阶级敌人死命的反对——有生命危险”。^{[23](P78-79)}因此,干部需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所谓“到底”,就是到死为止,就是“确定以后专为共主革命而生活”“确定自己应该是创造共产主义新时代的一个牺牲者”。^{[23](P78)}党的干部要成长为这样的人,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在处理家庭关系、男女感情等各种社会关系时,做到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第二,在面对生命危险,“杀头、坐牢、没饭吃(拉车卖大饼、油条)”时,做到革命到底,甘于做牺牲者;第三,在做了高级干部时,能够服从党的安排放弃个人名利、地位和权力。陈云指出:“这些问题是试金石。”^{[23](P29)}

中共干部投身革命并且领导革命,就要具备自我牺牲的觉悟与品质。中共革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坚信“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除开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以外,共产党没有他自己的利益与目的”。中共干部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领导力量,而“如果无产阶级不能解放一切劳动人民,解放一切民族,和解放全人类,那末,无产阶级就不能解放自己。”^[24]在此意义上,中国革命不仅是现象层面的政治斗争,而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全人类解放事业的重要环节。中共干部所献身的革命事业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阶级、中华民族和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因此,“‘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必要的时候,对于多数共产党员来说,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这不是由于他们的空想或沽名钓誉,而是由于他们对于社会进化的科学的了解与自觉。”^[24]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构成了“干

部”概念的一种重要人格内涵。自我牺牲的品质,常常构成了中共干部处理家庭、婚姻、个人利益问题的人格基础。在谢觉哉六十岁时,回顾一生,他认为:“我还没有死,还不很衰,一个原因,我对于自己身体虽无锻炼却少摧残。另一个原因则是加入党后,生活改变,旧社会求舍问田、男婚女嫁、失业得业,许多劳碌人性的事,一扫而空;而占领脑子里的是解放人类的崇高事业与美丽的理想,而且一步步接近,因而更一天天的高兴。”^{[25](P332)}在谢觉哉的思想观念中,求田问舍、男婚女嫁、失业得业,都是劳碌人性的事情,都远远不及为人类解放事业工作有意义和有价值。将党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视为超越个人家庭情感、个人名利得失之上的最高价值,这是干部的价值选择,构成了“革命者人格”的关键一环。

与此同时,“干部”概念还包含着高度现实主义的人格内涵,这就是干部的组织性。组织性是指将组织身份视为个人的第一身份,将个人完全融为组织的思想观念。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培养成员对党组织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并积极追求将这种组织性内化为干部自身的一种品质。组织性也被表述为集体主义,其内涵包括了干部的自我认知、价值取向、情感状态等多重因素。第一,组织性意味着在自我认知层面将自己视为党组织的一分子,成为党组织的一个细胞;第二,组织性意味着以集体利益为价值旨归,追求集体利益成为个人生命中最重要价值;第三,组织性意味着个人在情感上依恋组织,组织成为最重要的人际关系网络,构成干部个人心理意义上的家庭,所谓“以党为家”。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应该“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26](P207)}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要求:“只有真正加入组织,一切服从组织和愿意将自己全部贡献给党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才能成为共产党员。”^{[26](P91)}当然,很难以实证的方式统计有多少数量的干部形成了上述

人格,但作为中共推崇的政治文化,自我牺牲性和组织性的价值取向本身,也具有塑造人格的深远力量。由于“干部”概念具有特殊的人格内涵与道德规定,因此无论是党组织还是普通群众,都不仅仅将“干部”视为领导者与革命者,还将其视为理想政治的寄托与道德人格的楷模。正是因为“干部”概念具有此人格内涵,当少数干部出现道德问题时,往往会受到党内党外的严厉指责。

四、结语

总的来说,经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与话语创新,“干部”概念进入中文词汇后逐渐具有了政治职务、政治身份与革命者人格三重内涵。在职务、身份、人格这三重意义上,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对“干部”提出的政治期许与政治要求。193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做总结发言时说:“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27](P277)}毛泽东对全体中共干部提出的要求,既包括职务意义上的要求——有工作能力、能独立解决问题;也包括身份意义上的要求——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群众坚强领导。除此以外,中国共产党对“干部”提出的更多要求,却并不能完全为职务或身份所囊括,而是指向对于“干部”个人的人格与作风的要求。这是对于形成一种新的革命者人格的期许——富于牺牲精神;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

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宗派主义;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样一种新人格,是构成“干部”概念的重要内涵。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中培育了被指称为“干部”的新人,正是因为培养出了大批优秀干部,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党组织,才能为实现民族复兴与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政治基础。

参考文献:

- [1]孙矩. 干部概念研究[J]. 山东社会科学, 1993(1): 11-14.
- [2]李美啸. 观念与制度: 理解干部概念的两个维度[J]. 深圳社会科学, 2019(2): 69-75, 158.
- [3]应验. “党政领导干部”的概念辨析及其意义[J]. 中国人事科学, 2022(8): 21-31.
- [4]肖争鸣. 浅谈从“国家干部”中分解出“国家公务员”的必要性[J]. 求实, 1988(2): 24-26.
- [5]吴志华. 大一统的干部概念需要合理分解[J]. 探索与争鸣, 1989(1): 57-59, 65.
-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 上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 [7]毛桂荣. “公务员”概念的比较分析: 中国与日本[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14(2): 77-85.
- [8]中国共产党章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 [9]日本大辞典刊行会. 日本国语大辞典: 第5卷[M]. 东京: 小学馆, 1973.
- [10]乔治·萨托利. 政党与政党体制[M]. 王明进,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 [11]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册[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 [12]科捷尔尼科夫. 干部(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4.
- [13]中国共产党建设大辞典[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 [1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15]丛日云. 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分析[J]. 政法论坛, 2005(2): 16-25.
- [16]李里峰. “群众”的面孔——基于近代中国情境的概念史考察[J]. 新史学, 2013(7): 31-57.
- [17]李里峰. 近代中国的“群众”论述[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9-12-18(7).
- [18]汪仕凯, 陈沿潮. 由群众到人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基础和实践路径[J]. 江苏社会科学, 2021(2): 1-9, 241.
- [19]马克思·韦伯. 经济与社会: 第1卷[M]. 上海: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0.

[20]戴维·毕瑟姆. 官僚制[M]. 韩志明, 张毅,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2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选集: 第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22]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23]陈云. 陈云文集: 第1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24]刘少奇.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二)[J]. 解放, 1939(82): 9-15.

[25]谢觉哉. 谢觉哉家书[M]. 北京: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2015.

[26]解放社. 整风文献(订正本)[M]. 大连: 大众书店, 1946.

[27]毛泽东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责任编辑 史敏】

Multiple Connotations of the Concept of “Cadre” of the CPC

XIONG Chengshuai

Abstract: “Cadre”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the discipline of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and party building, with multiple connotations. The common concept of “cadre” mainly refers to the manager of an organization, which is essentially a job concept.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cept of “cadre” also represents a political identity. In the sense of duty, “cadres” refer to clerks who complete revolutionary or governance tasks, and are administrative officials in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s. The concept of “cadre” in the sense of political identity is the practical subject of the CPC leading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is the self reference of revolutionaries or politicians in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n the sense of political identity, “cadres” not only undertake transactional work, but also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of obeying the requirements of political parties, promoting the achievement of political goals, and making political decisions. Therefore, “cadres” are both managers and civil servants, as well as revolutionaries and politicians. By comparing the concept of “cadres” with concepts such as “masses”, “professional revolutionaries”, and “Weber style bureaucrats”, and examining 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concepts, the rich content of political identity connotation in the concept of “cadres” can be reveal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dres and the masses is not between the leader and the led, but rather in a dynamic process of mutual construction. By mobilizing, organizing, and serving the masses, cadres can gain and maintain their own identity. The concept of “cadres” in the sense of political identity has similarities with Leninist concept of “professional revolutionaries”, but the concept of “cadres” also has inherent personality attributes and value connotations. The concept of “professional revolutionaries” in Leninism emphasizes an external political identity norm of “taking revolution as a profession”, while the concept of “cadres” includes the “revolutionary personality” that emphasizes the internal self-regulation of cadres. This norm involves the deep value pursuit of cadres, and is manifested as a unique personality of cadres that combines idealism and realism. The examinat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cadre” is the basis for conducting relevant research.

Keywords: concept of “cadre”; political identity; revolutionary personality; professional revolutionaries